



西方法律与宗教学术论丛

主编 刘澎

Proselytism and
Orthodoxy in Russia
The New War for Souls

俄国的东正教
与劝诱改宗
争夺灵魂的新战争

[美] 小约翰·威特 (John Witte Jr.)

[英] 迈克尔·布尔多 (Michael Bourdeaux) 主编

刘 洋 译 隋嘉滨 校译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西方法律与宗教学术论丛

主编 刘澎

俄国的东正教与劝诱改宗

争夺灵魂的新战争

Proselytism and Orthodoxy in Russia
The New War for Souls

[美] 小约翰·威特 (John Witte Jr.)

[英] 迈克尔·布尔多 (Michael Bourdeaux) 主编

刘 洋 译 隋嘉滨 校译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国的东正教与劝诱改宗：争夺灵魂的新战争/(美)威特 (Witte, J.),
(英)布尔多 (Bourdeaux, M.) 主编；刘洋译，隋嘉滨校译。—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3

(西方法律与宗教学术论丛)

ISBN 978-7-5162-0231-9

I . ①俄… II . ①威… ②布… ③刘… ④隋… III . ①东正教—研究—俄罗斯
②宗教事务—行政管理—行政法—研究—俄罗斯 IV . ①B976. 2②D951. 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9176 号

Copyright © 1999 by John Witte Jr. and Michael Bourdeaux

Published by Orbis Books, Maryknoll, New York, U.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For
permissions, write to Orbis Books, P. O. Box 308, Maryknoll NY 10545-
0308, U. S. A.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13-2788

图书出品人：肖启明

出版统筹：赵卜慧

责任编辑：庞从容 唐仲江

责任校对：常高峰

书名/俄国的东正教与劝诱改宗——争夺灵魂的新战争

作者/ [美]小约翰·威特 [英]迈克尔·布尔多 主编

刘 洋 译 隋嘉滨 校译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010) 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010) 63056975 63292520

http: // www. npcpub. com

E-mail: mz fz@ npcpub. 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16 开 710 毫米×1000 毫米

印张/20.5 字数/ 426 千字

版本/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河北省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62-0231-9

定价/ 56.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纪念“葡萄园运动”中的同伴简·艾丽丝

| 目 录 |

导 言	1
小约翰·威特	

第一部分 宗教视角

俄国东正教会与外来基督教——过去的遗产	27
菲利普·沃尔特斯	
东正教与俄国转型	45
詹姆士·H. 比林顿	
福音与文化	59
斯摩棱斯克和加里宁格勒教区基里尔大主教	
1917年后俄国宗教间关系	69
亚历山大	
俄国大公教：遗物或现实？	84
谢尔盖·菲拉托夫 柳德米拉·沃龙佐娃	
劝诱改宗和俄国的穆斯林共同体——历史遗留或种族—民族威胁？	98
唐娜·E. 阿茨特	
俄国东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	128
尤里·塔巴克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136
米哈伊尔·M. 库拉科夫	

• 1 •

后苏维埃俄国的小教派和新兴宗教运动	147
谢尔盖·菲拉托夫	
仁爱的品质——唯一的机会	167
迈克尔·布尔多	
在前苏联的新教传教士	178
马克·埃利奥特 安妮塔	

第二部分 法律视角

关于俄国历史上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反思	205
菲鲁兹·卡齐姆扎德	
从人权角度看关于良心自由与宗教结社的俄罗斯联邦法律	216
T. 杰里米·冈恩	
俄国的宗教自由——第三人为被告辩护的意见陈述	228
哈罗德·J. 伯尔曼	
俄国的联邦和地方宗教自由法——捍卫和反对联邦制与法治的斗争	259
劳伦·B. 霍默 劳伦斯	

第三部分 新征程的路标

给在俄国的美国传教士的指导	289
劳伦斯	
给在前苏联的外国传教士的指导	296
安妮塔	
作者简介	305
索引	307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JOHN WITTE JR.	
PART ONE	
RELIGIOUS PERSPECTIVES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Foreign Christianity	27
<i>The Legacy of the Past</i>	
PHILIP WALTERS	
Orthodox Christianity and the Russian Transformation	45
JAMES H. BILLINGTON	
Gospel and Culture	59
METROPOLITAN KIRILL OF SMOLENSK AND KALININGRAD	
Interreligious Relations in Russia after 1917	69
ALEKSANDR SHCHIPKOV	
Russian Catholicism: Relic or Reality?	84
SERGEI FILATOV And LYUDMILA VORONTSOVA	
Proselytizing and the Muslim <i>Umma</i> Of Russia	98
<i>Historical Heritage or Ethno-national Threat?</i>	
DONNA E. ARZT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n Orthodoxy and Judaism	128
YURIY TABAK	
Seventh-day Adventists	136
MIKHAIL M. KULAKOV	

Sects and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in Post-Soviet Russia	147
---	-----

SERGEI FILATOV

The Quality of Mercy	167
----------------------------	-----

A Once-only Opportunity

MICHAEL BOURDEAUX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178
--	-----

MARK ELLIOTT AND ANITA DEYNEKA

PART TWO

LEGAL PERSPECTIVES

Reflections on Church and State in Russian History	205
--	-----

FIRUZ KAZEMZADEH

The Law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Religious Associations from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216
--	-----

T. JEREMY GUNN

Freedom of Religion in Russia	238
-------------------------------------	-----

An Amicus Brief for the Defendant

HAROLD J. BERMAN

Federal and Provincial Religious Freedom Laws in Russia	253
---	-----

A Struggle for and against Federalism and the Rule of Law

LAUREN B. HOMER AND LAWRENCE A. UZZELL

PART THREE

SIGNPOSTS FOR A NEW WA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Russia	289
--	-----

LAWRENCE A. UZZELL

Guidelines for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296
--	-----

ANITA DEYNEKA

Contributors	305
--------------------	-----

Index	307
-------------	-----

导　　言

小约翰·威特（John Witte Jr.）

我们有义务借助一切可获得的法律手段为人们的灵魂战斗，而不是让他们灭亡。（我们必须）对罗马公教势力与各新教团体所从事的持续、强烈地劝诱改宗活动……对各宗派（包括那些极权主义性质的宗派）的增多的活动作出回应……因为主要正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成为了这些宗派的受害者。

——牧首阿列克西二世（Patriarch Aleksii II），1996年12月26日⁽¹⁾

一场争夺灵魂的新战争在俄国爆发了，这是一场要挽回俄国人民传统的灵性与道德灵魂的战争，一场要保持对俄国东正教会忠诚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一场神学战争，因为俄国东正教会的莫斯科牧首教廷寻求将自身重建为俄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因为来自俄国与国外的互相竞争的各宗教团体开始活跃地相互诽谤与妖魔化。在俄国，先前数十年的普世精神正让路于宗教分裂与竞争的全新形式。从另一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场法律战争，因为地方与国家立法机构通过了法令以严格限制许多俄罗斯信教个人与民族的权利。在保护一切人的宗教自由与平等的光鲜的宪法外衣之下，俄国正在发展一种公然偏爱一些宗派而压制另一些宗派的新的法律文化。

本卷书分析俄国的这场争夺灵魂的新战争——它的宗教根源与维度，它的法律模式与措施，它的持久挑战与希望。斯摩棱斯克与加里宁格勒的基里尔大主教（Metropolitan Kirill of Smolensk and Kaliningrad），莫斯科牧首教廷的位列阿列克西二世之后的领导人物，提供了一份有力的宣言以阐明俄国东正教对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俄国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典范理解；菲利普·沃尔特斯（Philip Walters）与菲鲁兹·卡齐姆扎德（Firuz Kazemzadeh）则将这些观点置于长时段历史视野中加以考

[1] 阿列克西二世，莫斯科与全俄牧首，“Address of the Patriarch to the Councils of the Moscow Parishes at the Episcopal Gathering, 12 December 1996”，*Tsekovno-obschestvennyi Vestnik*，第6期（1996年12月26日），第7页，专栏1（以下简称“Address of the Patriarch”）。

察。詹姆士·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与迈克尔·布尔多（Michael Bourdeaux）叙述了东正教徒与其他宗教团体在苏维埃国家的转变及俄国宗教大觉醒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谢尔盖·菲拉托夫（Sergei Filatov）、米哈伊尔·库拉科夫（Mikhail Kulakov）、亚历山大（Alexandr Shchipkov）、尤里·塔巴克（Yuriy Tabak）与柳德米拉·沃龙佐娃（Lyudmila Vorontsova）作为圈内人叙述了俄国有代表性的宗教团体与运动，以及在历史上和当代它们之间的竞争。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Berman）、杰里米·冈恩（Jeremy Gunn）、劳伦·霍默（Lauren Homer）与劳伦斯（Lawrence Uzzell）提供了第一手的叙述，讲述了近来关于宗教的州与国家法律的阴谋，以及它们对基本的宪法权利与人权的公然违犯。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与安妮塔（Anita Deyneka）叙述了西方传教士在俄国的兴起。唐娜·阿茨特（Donna Arzt）叙述了快速增长的俄国穆斯林所处的困境。在结论性部分中，Deyneka 与 Uzzell 提供了关于在外国传教团体和俄国当地宗教与政治领袖之间的更多审慎与相互理解的指导方针。

这个导言提供了关于从这些篇章呈现的一些重要主题的简短纵览。第一部分概述俄国从十年前给予对一切人的宗教自由的政体到今日只给予俄国东正教会完整宗教权利的政体的显著转变。第二部分探讨俄国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一些“本体论差异”，这些差异就是这场争夺灵魂的新战争和任何试图努力缓解这场战争的核心问题。

从开放到灵魂战争

开放与大觉醒

十年前，俄国奉行对一切人的宗教自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开放与改革的革命性理念打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的桎梏，唤醒了俄国各种传统信仰。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各宗教复兴的时期，不仅包括俄国东正教，而且包括传统的基督复临派、亚美尼亚使徒传统派、浸信会、佛教、格鲁吉亚东正教、希腊大公教、犹太教、路德宗、罗马大公教、什叶派与逊尼派穆斯林、乌克兰自治东正教以及其他宗教团体。^[2]许多宗教团体曾被共产党的清洗与报复赶至地下，又通过四代信徒无数的牺牲与殉教而存活。^[3]对那些宗教团体，尤其是自从1917年

[2] 见本书中阿茨特、菲拉托夫、菲拉托夫与沃龙佐娃、库拉科夫、Shchipkov、塔巴克所著文章。亦见 Igor Troyanovsky, *Relig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A Guide to Christianity, Judaism, Islam, Buddhism, and Other Religions* (San Francisco, 1991年)。

[3] 见本书中比林顿所著的文章。

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遭受了巨大的神职人员、财产、文献与艺术损失的东正教会，戈尔巴乔夫发起了雄心勃勃的恢复运动。^[4] 这些团体反过来向脆弱的开放与改革运动（glasnost and perestroika）提供道德与物质支持。^[5] 外国宗教团体，尤其是来自欧洲与北美的新教徒与大公教徒，为了与他们的共同信仰者重新会合，提供慈善救济以及传播信仰，开始办理护照以进入俄国。^[6] 反过来，俄国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也能办理护照以拜访在耶路撒冷、罗马、麦加与其他地方的圣地。^[7]

这些有利于宗教的政策很快被转化为确定的法律条款。1990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签署了一项全面的新法律“良心自由和宗教社团法”（On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O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8]。1990年10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通过了它自己的法律“崇拜自由”（Freedom of Worship），这一法律重复与加强了苏联法律的许多条款，并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保存下来。^[9] 苏联与俄罗斯的法律都宣布了对全体公民的良心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广泛保证，都包括了对宗教歧视、诬蔑、虐待与强迫的强力禁止。^[10] 俄罗斯法律坚持“崇拜自由是俄罗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被俄罗斯的宪法与国际合约所保证”并包括“选择与坚持宗教信仰以及自由地改变它们的权利”^[11]。

1990年的法律不仅保证个人的而且保证正当登记的团体的宗教自由。苏联法律载明，“一切宗教与宗派须在法律面前平等”。“对一种宗教或宗派的相比于其他宗教或宗派的任何形式的特权或限制都须被禁止。”^[12] 1990年的法律都坚持国家

[4] 参看本书中沃尔特斯、伯尔曼所著的文章，更进一步请参看 Philip Walters, “A Survey of Soviet Religious Policy”，收于 Sabrina P. Ramet 编, *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1993 年), 第 17 页及以下, 以及 Sabrina P. Ramet, *Nihil Obstat: Religion, Politics, and Change in East-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Durham, N. C., 1998 年), 第 21 页及以下, 第 229 页及以下。

[5] 参看本书中比林顿、布尔多、埃利奥特与 Deyneka 所著的文章。亦见基里尔大主教, “The Church and Perestroika”, 收于 Troyanovsky, 前揭 *Relig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第 82—90 页; Michael Bourdeaux, *Gorbachev, Glasnost and the Gospel* (London, 1990 年)。

[6] 见本书中布尔多、埃利奥特与 Deyneka 所著的文章。

[7] 见本书中阿茨特、塔巴克所著的文章。

[8] 译文见 Troyanovsky, 前揭 *Relig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第 23—30 页 (以下简称《苏联法律》), 分析见本书中伯尔曼、冈恩所著的文章, 更进一步见 Kent Hill,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Brink: An Inside Look at Christianity and Glasnost* (Portland, Ore., 1991 年)。

[9] 译文见 Troyanovsky, 前揭 *Relig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第 31—37 页 (以下简称《俄罗斯法律》)。

[10] 《苏联法律》，第 1 条至第 4 条；《俄罗斯法律》，第 1 条至第 7 条、第 17 条、第 22 条、第 25 条、第 29 条。

[11] 《俄罗斯法律》，序言，详细阐述于第 3 条至第 5 条、第 13 条、第 16 条。

[12] 《苏联法律》，第 5 条；见《俄罗斯法律》中的相应者，第 8 条至第 10 条、第 16 条至第 19 条、第 23 条至第 25 条。

与宗教组织须尽可能地分离。宗教团体不可资助、干涉或作为职员服务于国家选举、世俗公众教育或其他政治事务。反过来，国家不可资助、控制、干涉宗教团体的崇拜、秩序、节庆、训练、教育或慈善等活动，也不得对这些活动征税。俄罗斯法律将与俄国外的共同信仰者的“国际交流与直接联络”的权利“建立与保持”在“不可剥夺的崇拜自由的权利”中。^[13] 它还包括了“传播信仰的权利”，被定义为“直接地或通过大众传媒、以传教、体恤与慈善活动、宗教指导与教育的方式，在社会中传播信仰”的权利。^[14]

这些对宗教自由的法令保证被1993年的俄国宪法所确定。宪法第14条规定：“1. 俄罗斯联邦须为一世俗国家。任何宗教皆不可被设为国家主办或强制的宗教。2. 宗教组织须与国家分离，须在法律面前平等。”第19条规定“一切人须在法律面前及法庭上平等”，并进一步规定“国家须保证权利与自由的平等，而不论一个人对宗教或信仰的态度”。第28条规定：“须保证每个人良心自由、宗教崇拜自由的权利，包括如下权利：单独或与其他人一起宣称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自由选择、拥有与传播宗教的或其他的信仰，以及遵照它们而行动。”俄国曾具体化了一些最先进的涉及宗教自由、改宗与改教的国际人权规范。^[15]

这些强力的法律保证帮助开创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自豪地宣告的俄国“宗教自由的黄金时代”^[16]。本土的东正教、大公教与新教的各教堂、神学院、学校与慈善机构开始被恢复或重建，有时还得到当地政治领导的物资支持。穆斯林清真寺、佛寺与犹太会堂，和它们的一些学校、慈善机构与出版社一起，也开始得以恢复。^[17] 特别是俄国东正教会的宗教文学、艺术品、圣像画、蜡烛、法衣与其他崇拜用的物资被大批进口，后来就在当地被生产。^[18] 一大批长期蛰伏的俄国万物有灵论团体、女神宗教、个人崇拜与秘教团体开始复兴，尤其是在主要城市之外。更惊人的是几个奇异的、组织良好的本土宗教的迅速增长，例如白衣兄弟会（the Great White Brotherhood）、圣母中心（the Center of the Mother of God）

[13] 《俄罗斯法律》，第25条。

[14] 《俄罗斯法律》，第17条；亦见《苏联法律》，第23条。

[15] 《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译文见Vladimir V. Belyakov与Walter J. Raymond编，《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Lawrenceville, Va., 1994年）。对该法分析见本书中冈恩所著的文章，更进一步见Natan Lerner，“Proselytism, Change of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998年第12期，第477—562页。

[16] 毕业典礼发言，美国埃默里大学，1992年5月11日。

[17] 见本书中阿茨特、塔巴克所著的文章，以及Troyanovsky，前揭*Relig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s*中的文献集。

[18] 见本书中比林顿所著的文章。

与末约教会 (the Church of the Last Testament)。^[19]

俄国的宗教觉醒不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外。紧跟 1986 年切尔诺贝利灾难及随后的恶性事故、地震与干旱的灾害之后，外国宗教团体就已开始稀稀落落地进入俄国以提供慈善救济与长期关怀。^[20] 1990 年的法律通过后，这些外国宗教团体大量地来到俄国。它们之中，从西方来的有福音派、五旬节派、主流新教徒、罗马大公教徒、摩门教徒、文鲜明统一教徒、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以及其他人^[21]；从中东来的有什叶派、逊尼派与苏菲派穆斯林以及一些巴哈伊教徒^[22]；从东方来的有韩国的长老宗与卫斯理宗信徒，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教徒、印度教克利须那派信徒 (Hare Krishnas)、拉斯特法里教徒 (Rastafarians) 与佛教徒，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钦莫伊大师 (Shri Chinmoy) 协会、勒里希运动 (the Rerikh Movement) 及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这些宗教团体中的许多成员在街上，挨家挨户地或者通过布道、发小册子和书本宣传它们的信仰与活动。其他团体组织游行、营会、展台广告与大众传媒，或租借露天运动场、剧院与公共大厅来举办宗教节庆。许多团体也开始创办学校、医院、慈善组织、青年社团、老年之家与其他社会服务。^[23]

少数所能获取的可靠的人口统计研究表明：虽然这些外国宗教团体取得了进展，但较之于俄国东正教会与其他当地俄国团体显得相当有限。马克·埃利奥特与 Deyneka 的文章表明，1997 年，在人口 2.8 亿多的前苏联地区，新教传教力量只有 5606 人，他们分散在 561 个团体中，并且踯躅不定。^[24] 确实，如 Shchipkov 所说，俄国新教教会，包括本土的与外来的，在数量上增长了一倍多，从 1993 年登记的团体总数为 1002 个到 1996 年的 2280 个。^[25] 但俄国本土的东正教会与大公教会经历了几乎相同增长，并且它们的绝对数量使新教教会相形见绌——从 1993 年登记的团体总数 4815 个到 1996 年的 7666 个。实际上，1996 年俄国穆斯林团体登记的更多 (2494 个)，相当于所有新教团体加在一起的数量 (2280 个)。^[26]

同段时期新兴宗教团体在俄国的增长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但它们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小。统一教会在俄国的困境是个典型的例子。根据谢尔盖·菲拉托

[19] 见本书中菲拉托夫、Shchipkov 所著的文章；亦见 Ramet，前揭 *Nihil Obstat*，第 308—340 页。

[20] 见本书中布尔多所著的文章。

[21] 见本书中埃利奥特与 Deyneka、菲拉托夫所著的文章。

[22] 见本书中阿茨特所著的文章。

[23] 见本书中埃利奥特与 Deyneka、Uzzell 所著的文章。

[24] 见本书中埃利奥特与 Deyneka 合著的文章。

[25] 见本书中 Shchipkov 所著的文章。

[26] 见同上与本书中阿茨特所著的文章。

夫所言，统一教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已开始通过使用旅游与商业护照的途径秘密进入苏联，它属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活跃地在俄国劝诱改宗的第一批外国团体。在 1990 年文鲜明牧师与戈尔巴乔夫总统会面后，统一教会发起了积极进取的运动，包括会议、研讨会、分发课本、学习旅行及类似活动，尤其以政治领导、高校与初等学校的学生与教师为对象。“好几万”名俄国人参加了这些活动，并且到 1994 年，有两千多个国立学校使用了统一教会免费提供的“道德课本”。虽有如此大的努力与开支，但是 1994 年俄国的统一教会在其顶峰时仅仅吸收了 5000 名正式成员；到 1997 年年末，这场运动声称其成员少于 3000 名，并且数目还在下降中。^[27] 实际上，三个最大的在俄国被称为“极权主义宗教”的——文鲜明统一教、印度教克利须那派与耶和华见证会——1996 年在全俄总共有 248 个登记的团体。^[28]

风暴的征兆

无论它们真正的数量与增长速度如何，这些外国宗教团体嘈杂的到来最终在俄国引起了相当大的憎恶。俄国新教与大公教团体开始憎恶来自西方与韩国的一些共同信仰者的语言上的欠缺和用金钱开道的做法。^[29] 俄国大公教徒与新教徒也憎恶对他们的教义、礼仪与教会革新的不切实际的批判——这些对他们而言是以严酷隔绝方式推行并长达数十年的。对于在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争夺对他们的管辖权的苦涩政治斗争中遭受了野蛮虐待的希腊大公教徒来说，这种憎恶是加倍强烈的。^[30] 对于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伊朗弥赛亚主义与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煽动与宣传”所鼓动的一些穆斯林团体的政治化，俄国穆斯林领袖与政府官员的担忧渐增。在什叶派、逊尼派与苏菲派团体的各自内部与彼此之间，许多冲突也在意见相左的经学院校之间爆发；这种张力有时被俄国穆斯林人口中强烈的民族、种族与语言差异所加剧。^[31]

然而，来自俄国东正教会的莫斯科牧首教廷表达了最强烈的担忧。对于在俄国的宗教思想新市场中争夺灵魂的外国传教士从宗教与经济方面的“大量涌入”，莫斯科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 1991 年就已对此表达了不安。^[32] 起初，牧首教廷的憎

[27] 见本书中菲拉托夫所著的文章。

[28] 见本书中 Shchipkov 所著的文章。

[29] 见本书中 Deyneka、菲拉托夫与沃龙佐娃、库拉科夫、Uzzell 所著的文章。

[30] 见本书中比林顿、Uzzell、沃尔特斯所著的文章。

[31] 见本书中阿茨特、Shchipkov 所著的文章。

[32] 见本书中伯尔曼、基里尔大主教、沃尔特斯所著的文章。

恶集中于独立传教士。这些人是文化上与语言上不称职的传教士，倾向于“一种无拘无束的长途漫游者的教牧方式”，这种方式导致“打了就跑的福音传道，造成对于新信徒培训的忽视以及对于应重视的与现存教会的伙伴关系的疏忽”^[33]。同时，莫斯科牧首教廷的官员特别批评了“极权主义宗教”，控诉这些团体使用“非法的物质诱惑”赢取新皈依者，然后使它们的皈依者转而反对“他们的俄国家庭、信仰与文化”^[34]。

到了1993年，莫斯科牧首教廷的憎恶更广泛地指向所有的，特别是来自西方的，“组织良好、资金充足”的传教团体。除了宗教上的独立者与极权主义宗教，不受欢迎的“外来的劝诱改宗的信仰”现在还包括形形色色的罗马大公教徒、主流新教徒与西方福音派。^[35] 牧首教廷的成员常常将这些团体等同看待，并发表了三条对它们的指控：第一，所有这些外来劝诱改宗的团体迫使贫穷的、人手不足的俄国东正教会进入了争夺灵魂的不公平竞争——不仅包括俄国街道上迷失的灵魂，而且包括俄国教会里获救的灵魂。^[36] 第二，许多西方劝诱改宗的团体看来倾向于破坏俄国人民的灵魂——通过将他们淹没于西方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毒潮，而俄国不愿意，也不可能愿意接受这些。^[37] 第三，这些外来劝诱改宗的团体中有许多对俄国人民与社会秩序是有危害的——通过破坏家庭；鼓励公民的不顺服；勒索财产与金钱；使用迷幻剂与心灵操控；犯下殴打、强奸与其他罪行来对付不顺从的成员；甚至将引诱杀人、自杀与叛乱来作为信仰的行动。^[38]

这些反对外来劝诱改宗的团体的指控可在莫斯科牧首教廷于1993年后的一段

[33] 见本书中埃利奥特与 Deyneka、Uzzell 所著的文章。

[34] 莫斯科牧首教廷对外关系部的成员 Alexandr Dvorkin 于1996年5月29日在牛津的一次会议上的评论。当我请他详细阐明时，Dvorkin 将“非法的物质诱惑”定位为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英语课、教育和工作；将宗教文本和仪式灌输到公立学校课程中；使用电视、报纸和其他大众传媒来宣传信仰；组织“喧哗、愚钝、运动般的嘉年华”。

[35] 根据 Alexandr Dvorkin 在同一会议上的评论。他所列的“从事劝诱改宗的信仰”包括：(1)“没有东正教的同意而建立主教管区、教区和修道院”的罗马大公教；(2)“传统的新教各宗派”，包括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成员（卫斯理宗、芬兰与德国路德宗、自由福音派、韩国新教）；(3)“新兴宗教运动”（尤其是印度教克利须那派、巴哈伊教、文鲜明统一教、耶和华见证会）。更进一步论述参看伯尔曼、比林顿、冈恩、基里尔、Uzzell 所著各章中的讨论。

[36] 见本书中伯尔曼、比林顿、沃尔特斯所著的文章。

[37] 见本书中 Uzzell 所著的文章。

[38] 见本书中冈恩、基里尔大主教所著的文章。

时期中发表的数十份声明里看到。^[39] 1993年，基里尔大主教抱怨正在利用后苏维埃俄国的精神真空的传教士的不光彩行为。^[40] 在本书中他所著的一章里，详细阐述了他的批评：

传教工作的自由一经允许，甚至当它开始从长期的疾病中恢复，还虚弱地站立时，一场反对俄国教会的战争就开始了。大群的传教士涌进来，相信前苏联地区是一片辽阔的传教地域。他们行事，仿佛当地教会不存在，仿佛福音从未被传扬。他们甚至没有努力熟悉俄国文化遗产或学习俄语就开始传教。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意图不是宣扬基督与福音，而是使信徒勉强地离开传统教会，加入他们自己的团体。也许这些传教士真诚地相信他们正面对非基督教的或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人民，而未想到我们的文化是被基督教塑造的，我们的基督教，通过殉教者与在迫害面前仍坚称信仰者的流血，通过坚称信仰的主教、神学家与平信徒们的勇气依然存在。

国外的传教士携带美元而来，以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与送他们到国外学习或休息的许诺收买人民。我们期望基督徒同道在我们自己的传教服务中支持与帮助我们。然而，实际上，他们开始与我们的教会开战……所有这些导致了在先前数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普世教会关系几乎完全破裂。它无视人民的精神与文化传统而冒犯了他们的民族与宗教感情，占压倒性多数的人们拒绝接受这种行为。实际上，倘若缺乏宗教教育，人们会倾向于对我们正说到的好斗的传教士与属于他们自己的信仰或信条的普通人不做区分。对于今天的许多俄国人，“非东正教徒”意味着那些来破坏人民精神团结与东正教信仰的人，通过貌似合理的手段或违反规则试图使人们勉强离开教会的精神殖民者。^[41]

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抱怨西方传教士在俄国东正教会自身内部培育的自由主义的腐蚀性价值：

[39] 关于实例，参看 V. Polosin 与 G. Yakunin，“Federal Authorities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未发表的手稿，1996 年 11 月，第 16—38 页，以及 Jane Ellis，“The Moscow Patriarchate's Attitude t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 Decade of Misunderstanding”，未发表的手稿，1998 年 6 月，第 2—7 页。

[40] *Nezavisimaya gazeta* (1993 年 6 月 5 日) 的采访，被引用于 Ellis，前揭 “The Moscow Patriarchate's Attitude”，第 2—3 页。亦见 Kirill，前揭 “The Church and Perestroika”。

[41] 见本书中基里尔大主教所著的文章。

东正教意识到现在正被极端自由主义侵蚀；对于教会，极端自由主义能导致悲剧后果：宗派分立、教会内的不和、对东正教信仰的腐蚀以及根本的毁坏。我们必须通过我们对信仰的坚持、对传统的信仰、关于基督之爱的活生生的东正教宗教经验，以及对每一位个体信徒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的关爱，抵御这一毁坏性的过程。^[42]

在莫斯科开会的主教议会甚至更尖刻地指控外来传教士：

我们表达对如下情况的担忧：新教的假传教士在俄国持续的劝诱改宗活动，以及有组织的伪基督教的与伪宗教的宗派、新的异教团体、秘密教徒与魔鬼崇拜者在独联体与波罗的海各国的增长。议会对这些伪宗教组织的追随者与保护者发动的反东正教运动深感不安。议会成员们号召整个教会通过宗教教育与护教学，通过教育东正教徒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对抗这种错误的传教活动与宗派主义。我们承认每个人享有的良心与宗教自由的权利应被尊重，但这些极权主义宗派的领袖实际上剥夺了他们追随者的这些权利，并对他们行为的批评抱敌对态度。那些试图反对他们的人遭受宗派领袖与他们高地位的保护者的残酷迫害，包括威胁、心理压迫、网罗罪证、诽谤与反复搜查他们的财产。^[43]

这些并非虚言。莫斯科牧首教廷的官员数次要求对俄国境内的外来传教活动进行（甚至历时一代人之久的）限制。^[44] 这将容许本土的教会从它们的共产主义困境中恢复，并使它们能够公平竞争。^[45] 来自俄国与国外的东正教神学家在不同的关于传教的普世教会会议上越来越急迫地推动这一议案。^[46] 未与这些官方情绪保持一致的东正教神职人员面临强力的惩戒——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免除圣职与开除教籍。^[47]

当那种的外交性的对普世教会的请求失败时，莫斯科牧首教廷转向寻求国家

[42] 见“Address of the Patriarch”。

[43] “莫斯科主教议会的决议”，1997年2月18日—23日，第35条，收于*Pravoslavnaya Moskva*，7（103）（1997年3月），第11页。

[44] 见这卷书中埃利奥特与Deyneka合著的文章。

[45] 见同上中的引文；亦见“Declaration of the Holy Synod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3 April 1990”，收于Troyanovsky，前揭*Relig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s*，第66—72页。

[46] 参看Joel A. Nichols，“Mission, Evangelism, and Proselytism in Christianity: Mainline Conceptions as Reflected in Church Documents”，*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1998年第12期，第563—652页。

[47] 见本书中沃尔特斯、比林顿所著的文章；亦见Polosin与Yakunin，前揭“Federal Authorities”。